

1.

骗子经济



1 骗子经济

在骗子经济中幸存

联邦总理及其政党在大选之前声明绝对不会提高税收，而仅仅过了几天，他们就不再记得自己的承诺。此情此景，自然不会是一种“有关税收的谎言”，而是在艰难时期对不公平的状况的一种补偿。

当德国电信总是把费用过高的账单寄到数以千计的用户之手的时候，这自然又是一次“疏忽”

当饭店老板、旅馆业主、个体经营者和手工业者厚颜无耻地把欧元当成是抬高价格的手段的时候，从逻辑上来说，这可能只是几个“害群之马”，但他们已经损害了自身的未来形象。

当善于心计的网络营销和丧尽天良的银行家联手，以完全超高的价格把垃圾房产兜售给数以万计的联邦公民的时候，这自然又是“为了符合市场要求”而为之

当外科医生把使用过的心脏瓣膜植入病人身体，却又以新品价格计费，而且数以百计的同行都到医疗保险账户中结算那从未有过的费用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抱怨“在健康事业中缺少成本意识”。

当法兰克福的最高检察官沃尔福冈·绍蓬斯坦纳证实建筑主管部门的几十名官员在“曼哈顿”项目中犯有受贿罪的时候，这仅仅又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整顿过程”，它发生在一个运作得非

常出色的服务性行业中。

正当戴姆勒—克莱斯勒、德意志银行或者德国电信之类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将自己本已丰厚异常的百万薪酬再增加到千万薪酬，并因此损害到股东的财富，致使数以千计的员工被扫地出门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们更愿意谈及的还是“具有竞争力的补偿结构”的必要性。

□ 迅速成交，不正当的交易……

我们已经习惯以孩子的眼光去审视有关政治、经济的日常报道，而孩子们在学习阅读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井然有序的。我们的感觉器官源自这样一个时代，即那时的人们只需要区分善与恶即可；即便那时也存在着不公平、嫉妒以及缺少和睦相处，但每一个人都还能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平衡。

这样的时代，我们已无从谈起，因为它成为了过去。不管是出于习惯的影响还是多愁善感的原因，我们都坚持这样的假定，即在工作生活中人们不顾一切风险的理由还是相当充分的。当每一个人都训练有素，而且努力向上，那么他就会找到与自己的才干相吻合的职位。

由于我们的出发点在于认同经济还是完全有序的，所以，我们年复一年地过滤掉了逐渐增多的坏消息。时间一长，坏消息就演变成为许多无足轻重的“个案”。我们始终拒绝面对这样的现实，即有确切数字的行贿受贿以及欺诈丑闻在发生，它们足以使整体经济状况产生问题。有人会冷静地做出假设，那些众所周知

的事件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因为一般来说，事件的披露或多或少有其偶然性。

但是，所有这些破产和倒霉事件的制造者都为自己在工作上的力不从心列举了充分的理由，因此我们早就放弃了对他们进行责任追究。今天，如果有谁还会记得老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秘密献金一事，那么他或她就会对罗伊那档案感兴趣；也会对 BSE 和除草醚丑闻感兴趣；并对每天都遭受到媒体狂轰乱炸的其他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感兴趣。是的，其实只要不牵涉到我们个人本身，我们就不会对导致我们国家发生悲惨状况的原因发生兴趣。由于受到各党派、政府部门、企业和协会的宣传机器那种蛊惑人心式的宣传的影响，我们已经麻痹大意，并对近几年来在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变化视而不见。

生态毒小麦、大公司的逃税、交易所的欺诈、做假账、科隆的社民盟处在献金泥潭之中、房地产腐败、永无休止的破产风波——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习以为常，它们是具有健康核心的竞争社会的运营事故，虽然显得有些遗憾，但是无法避免。这是一种在将来还会有所发生的错误。

实际上，在我们的经济、政治体系中，犯罪已经相当普遍，以致正确的行为只能作为例外加以对待。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经过了持续的发展，现在却成为了最不社会的市场经济。每一个人都拿到了自己能得到的东西，然而却保留住了自己应当付出的东西。这里并非是一种公平、开放的竞争，而是可疑分子的独断专行和强势群体的天下。真实的商品和服务的互换不再是经济过程的目的，而是毫无效率可言的大发其财。迅速成交，不正当的交易，然后获取巨额暴利——这就是相当多的企业

家和经理人梦寐以求的。

在过去，拥有一家自己的企业、组建一个律师事务所或者至少拥有在名声显赫的大公司工作的经历，曾经是所有职业目标中的至上者。可是现在，面额数百万的交易单、快速的佣金业务、冠冕堂皇的骗税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美国式的疯狂资本主义的胜利之师，其道德沦丧已经在加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始，华尔街就着手经济改革。银行、退休基金、储户和投资者都强烈要求为其资本获得更高的红利，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与公众股份公司的经理签订了厄运般的合同条约：如果他们将股市推至最高点，那么就答应他们充当公司的操盘手，并可以获取可观的收益。

这不仅仅是交易所史无前例的开端，而且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全球化”或“疯狂资本主义”的开始。《明镜周刊》竟然在其标题故事中，将这小说般的概念定义为“猛兽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我们明白了，这更是一种骗子经济。美国国民经济的飞速转动，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做假的数据，而“猛兽”原来就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

在欺诈被戳穿之前，所谓的“股东的反叛”散布的正是害怕与恐惧。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老板们都在翻版美国式的成功模式。公司实施了重组，公司的有价证券也经过了归类整理，然后，公司裁减了大批的员工，并尝试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利润率。“我只有一个目标 利润 利润 还是利润。”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老板尤尔根·施累姆普曾如是说。他的同事尤尔根·多尔曼因此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为过，即为了这一目标而将有上百年历史的化学公司赫希斯特（Hoechst）分解得支离破碎。

在交易所里，行情的上扬幅度远大于企业的赢利幅度，因此也就逐渐形成了硕大无比的投机泡沫。就像公司的经理一样，为了尽可能高效地投入使用生产资本，交易所的投机者对金钱的贪婪使得原本表现得理性的意识变得不可理喻。公司的长远目标被搁置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因为受到股票投机利润的诱惑，公司的老板最后只有这样一个目标，即尽可能快地变得无比富有。那些适宜于身处巅峰的人物的东西，可能就会使大批收入尚可的人家变得不名一文。正如欧洲储户一样，轻而易举就可以到手的金钱使得诸多害怕风险的美国储户变成了贪婪的投机者。如果有人仅凭几张股票或基金债券，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赚取了他辛苦工作一年的所得还要多得多的话，那么每一种严肃的行为都会失去它的吸引力。

对股票的幻想，其后果如何还有待观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美国的情形无异于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数百万的劳动者都把自己用以养老的大部分收入完全寄托在交易所的运气好坏之上。那些试图通过交易所行情获利而使国家养老保险减轻负担的举措，与臭名远扬的“里斯特部长养老金”有什么不同呢？

☐ 没有了钱财，留下的却是贪婪

由于交易所行情急促上扬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厄运。雅皮士的一代，具备了稍稍培训便可操作数字式设备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一来到这世上就要求拥有生活持续富足

的权利。然而若干时间之后，事情却果真如此，即如此这般的“新经济”使得有关借方与贷方那钢铁般的定律荡然无存。网络公司无非就是将一个被窃取的商业创意装进行李箱而已，它们几乎无须创立什么公司，可是在交易所里突然间值几十亿，所有的人包括经理、员工和股东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意义上的赚钱方式，即通过真实的劳动有所得大概已经有些过时，其艰辛的程度是许多快速致富的幸运儿所无法切身体验的，只有通过父辈的叙述才略知一二。

在此期间，股东们那虚涨的财富由于行情的破灭又快速被蒸发，就像原有的一样。仅在美国，股东们就失去了 50000 亿美元。在德国的交易所里，大约有 12000 亿马克或 6000 亿欧元化为乌有。

钱没有了，可留下的却是贪婪和那令人无法容忍的轻率表现。就像受投资者的要求所驱使的那样，在交易所里所受的损失使得目前的整个商业世界变得毫无顾忌。没有人再会对四五个百分点的资本利润率感到满意，而前些年这还是为大家认同的。根据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大小，人们现在要求的是 12%、15%，甚至是 20%，而且是纯利。工业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合理化储备；商业则组合成越来越大的经营单元；服务性行业却削减了经营成本。想要以合法的方式再次有所提高，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如此。

☐ “热气球”和做假的数字

希望得到的赢利并没有如期真实地出现，因此就肆意采取一

些手段。大西洋两岸的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全部收购竞争对手，使他们缺席或者提起法律诉讼；若还是无济于事，那就说这是哄抬的价格。订单发放者被收买，客户则以回扣加以引诱。产品的质量被搁置一边，公司销售的是形象和包装，而不是产品的那些真实特色。与此同时，人们以实际上是亏损的“赢利”来欺骗股东，向他们展示压根儿就是负债的财富，然后使上浑身解数从公司的金库中捞取钱财。

每一次的账目几乎不再有人相信，经营报告不再被认真对待。不仅仅是在美国，在我们这里也一样，到处是做假，撒弥天大谎。自从得克萨斯州那家经营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能源的安然公司破产以来，地球上的投资者就身陷于警报声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家美国的第六大企业，其账目上暴露的无非就是一些“热气球”和做假的数字，不可能是巨额的财富和持续增长的赢利。然而，安然公司仅仅是个开始。美国的第二大电信企业——世界电信公司因巨额负债而破产，在此之前，公司创始人泊尔尼·艾伯斯被解雇之后就已经发现了约 40 亿美元的假账。

真实的情形渐渐地浮出水面，即世界著名的公司如通用电气、IBM、特科国际、环球电讯和施乐，为了向人们展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赢利，也都利用了极具创造力的财务人员的天赋。英国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特斯证实，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公司在 2000 年其赢利水平都虚高约 20%。之后，一种极度悲观的论调在蔓延。

投资者必须明白，审计师因接受公司审计账目的业务，他们因此与公司同穿着一条裤子，在紧要关头他们的审计资质是不值一钱的。世界上最大的审计公司之一——安达信公司，甚至是在

帮助安然公司销毁那些使自己颜面尽失的材料的时候被无意俘获的。

德国的公司自然也明白此类业务的道理。除了众多在新市场板块上列有其名的股份公司之外，有类似嫌疑的公司甚至还有 DAX 指数公司，如海德堡的金融服务机构 MLP、法兰克福的设备制造商 MG 科技和汉堡的房地产企业 WCM。真是好样的，美国式的极具弹性的做账规则竟在企业经济学之父奥根·施马凌巴赫的故乡找到了如此之多的追随者。在新市场板块中，美国式的规则（专业上的称呼就是 GAAP，即“普遍接受的财务原则”）甚至就是义务，而在法兰克福左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尽全力去利用自由空间的公司不在少数。

时至今日，保持做假账记录的首推波多·施纳伯尔。这位被判处 7 年监禁的原巴伐利亚康路股份公司的创始人，在策划一个现实虚拟的公司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所描述的 95% 的销售额纯粹是纸上谈兵。

萨尔布吕克的企业经济学教授卡尔汉斯·库丁认为，大多数股份公司的账目都是不稳固的。而真实的东西，只能是那些创始人、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们习惯去捞取的数字。当德国的高层经理们向全体雇员发出储蓄的号召，并为了十分之一个百分点而顽强地与工会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却用双手从公司的账户中为自己捞取大量的钱财。因此，《经理人杂志》肯定不是在嫉妒什么，它甚至断言说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道德沦丧”。那么，人们应当对德国电信公司董事会的行为做何评判呢——他们在 2001 经营年度中损失了 35 亿欧元，此外还使得股东的财富一文不值，却批准为自己增加 50% 的花销？还有，那个德意志银行的

董事会代言人该怎么办呢——他在一个经营年度中就捞取了 1100 万欧元，而银行的赢利和股市行情却下跌了 20%？这样的支付方式肯定不会与效益挂钩，更多的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自助行为。

谁如果有机会管理他人的钱财，决定投资方向，控制着现金流，那么在现今的社会，他或她明显就不会思量着已经托付给自己的钱财的状况如何，而是首先想着自己的生财之道。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美林证券的银行投资员和分析师们，都会以极大的热情向他们的客户推荐购买这样的股票，即他们自己认为是“垃圾股”甚至是“粪便股”的股票，以及他们自己急于脱手的股票。德意志银行也无二致，它曾在那样的一天时间里建议数百万的小型投资者快速地购进正在迅速贬值的股票，而此时它自己（可收取高额佣金）却受一个亚洲大客户的委托，将超过 4000 万欧元的电信股票抛到市场上，并使行情看跌。

□ 体制，就像瘸腿的老马一样

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新的欺诈或腐败事件。作为运作良好的法律体系的例证，而对此加以评估，简直就是对现实存在的经济状况的错误判断。变得明朗的事情只能如此，即对司法的公正性造成了伤害，或者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倒正是时候。只有当表露出“有证据的初始嫌疑”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以文件形式出现的或者经证人宣誓保证的确凿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检察官才能采取积极的行动，搜查办公室、查封文件和传唤证人。遭受此般待遇的就有柏林的银行股份公司、巴登州的弗特克斯公司、科

隆的垃圾焚烧设备公司，此外还有威斯特法伦的越障表演者和马匹交易商胡哥·西蒙。

那些自我感觉怀疑一切的庄严的机构和公司，都陷入了招惹嫌疑的境地。在纽伦堡，联邦劳动局长年以来就对调查数据进行系统做假；在慕尼黑，公共养老院对自己的业绩进行了美化；在斯图加特，马达冲压设备出版社就对杂志的印数采取欺骗的手法。在此，个人的单独行动几乎不再起决定作用，虽然还有像爱尔兰联合银行的约翰·鲁斯纳克这样的外汇交易员，仅此一人就造成了多达 7.5 亿美元的损失。

刑事犯罪统计证实了这样的趋势：在所有可列举的犯罪类型中，经济犯罪增长的幅度最大——仅在 2001 年就上升了 23.1%。由于此类犯罪几乎总是涉及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的巨额数字，所以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班贝克市的总检察官罗兰特·赫尔格特如是说：如果能够成功地阻止此类覆盖面广的腐败现象的发生，那么，德国的国民经济将每年增长约 4 个百分点。

假定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为前提，人们甚至还可以将不断增长的经济犯罪行为比做经济领域中多样化的证据——如果这些行为果真呈动态发展的话。实际上，这一体制就像一匹瘸了腿的老马一样。即便在欧盟的中等经济体之内，德国也是末位红灯板上有名。这并不是说，是德国的强大实力驱使着德国的企业家、经理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闯入骗子经济的灰色区域，而是它的不足之处。由于他们几乎无法与全球的竞争对手保持同等的效率，所以他们就会像某些服用兴奋剂的顶尖运动员一样，越来越频繁地尝试导致腐败、欺诈和欺骗手段的甜甜毒剂。

虽然出乎意料之外，但老板们那急促的步伐也催促着工会加

快了脚步。许许多多经过组织的雇员变得越来越有头脑，他们对工资的要求也越来越过分。非常明显的是：主要在机关从事工作的人员都在为将来而奋斗。他们以前天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和现代的罢工策略，深入地推行着分配式的战斗，因此其结果便是在职人员越来越少，成为失业者的越来越多。

当公司有能力对付工会所提出的要求的时候，许多中产阶层的人士其处境已十分艰难。一方面，银行要求他们归还用以支持日常业务的资产贷款；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持续增加的成本压力。并不奇怪，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采取了越来越粗暴的经营手段。谁不会或不愿采用这一招，那他或她就面临破产的威胁。

□ 老百姓的钱袋被紧盯着

在这一不再美丽而且毫无新意可言的经济世界里，诚实的参与者抽到的总是差劲的纸牌。不管是雇员，还是消费者，还是病人、建筑工人或投资者——人们总是会面临受敲诈、受欺骗、受欺诈的危险。从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和作为执法机构的司法部门那里，很少有人会期待得到什么帮助。当他们采取措施的时候，行动几乎总是太迟。

原因可能会是这样的，即国家自身已经成为骗子经济的一部分。作为政治意志结构的承载者，各党派都被深深地交织在新近出现的各种献金和腐败丑闻之中。政府总是根据机会原则来采取行动，而不会根据真实性原则去行事。议会中的议员们对各种付费的兼职活动趋之若鹜，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拒绝公开这一事实。

据说，只有联邦总统是了解实情的。各种法令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尤其在经济犯罪领域，人们对司法部门的要求过于苛刻。

由于只有少数几个检察官有能力读懂这些账目，并看穿那复杂的欺诈手腕，所以与其他领域的犯罪活动相比，经济骗子更有机会安然脱身。当人们毫不怜悯地对一个被逮住的小偷实施惩罚的时候，主任办公室的可疑分子通常总是被免于处罚。在所有的类似行动中，当快要面临控告的时候，其中有 80% 的都是以相互妥协而中止进行：可疑人士承认过错，接受适度的处罚，并在第二天就可以开始新的经营业务。处罚实施人员也感到高兴，可以在案件的卷宗上打上一个钩，法官们也节约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时间。

国家的行政机构只有当自己的经济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才会认真加以对待。为部门收益操心的财政部长，会非常大方地同意设立更多的计划岗位，如税务侦察员、海关官员和企业审计师等职位。而对检察官的企业经济学培训项目却拨不出任何款项。对我们的政治家来说，保护私有财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这一点已经得到金融市场现状的充分证实。在新市场板块发生不计其数的欺诈行为以及受“官方监督”的股票交易中出现众多的局内人士丑闻之后，小股东保护联合会要求对证券交易采取更严厉的监督措施。与此同时，联邦经济部的“绿党”国务秘书马格瑞塔·沃尔福女士提议颁布一项新的法律。该法律应当改善小股东的法律地位，并强化对股票市场的监控。

其结果，也就是在“议会范围”内进行磋商之后，出台了一部被称为“金融市场促进法”的法律。该法律的保障对象首先是银行、经纪人和基金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私有投资者的利益。

目前在德国，对股票市场实施监督的是一个叫做“联邦金融服务监督局”的机构，它不是一个像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一样的高效率的交易所警察。该机构的钱款收入正好来自那些接受监督的机构——银行和德意志交易所股份公司。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事情将一如既往。

在冷战期间从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在做假账者和价格策划者到处充斥的年代里却不再如此，作为自给自足者、消费者和储户的个人需要对自身物质财富的存在牵肠挂肚。每一个人都在紧盯着他的钱袋——医生和垃圾清扫者、银行和房屋建造者、电器维修工和能源供应商、财务部和墓穴管理部门、铁制品修理工和社区管理员、房东和保险商。有别于骗子经济中充当着税务咨询师和检察官的职业活动家，在保卫自己的收入和财产的防卫战中，单一的个体可谓势单力薄。为此，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可想而知总是属于弱势群体。

在中学阶段，人们学习了许许多多有关罗马历史的知识，但很少有关当代德国的知识。没有人会教授我们如何在汽车交易商那儿拿到折扣，如何压低银行的费用，如何寻找出最实惠的电话付费业务，如何告诫房东要收敛一些；没有人会向我们解释，在面对欺骗性的旅游组织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没有人会对我们说，在面对铁制品修理工开出的超高价格账单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以及在面对配送商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在工作场所聚众生事——这就是对员工或同事的有意刁难，其目的在于没有任何补偿的条件下将他人赶走——而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就像听任一对离婚的夫妻面对着种种压力一样。很明显，我们的文化部长对具有非常处世能力的公民兴趣不大——其实，教

育的真实灾难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在这个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社会里，得以幸存者惟有那些具备了坚强的自我保护意志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不同的事件中学到必要的知识。本书不会给咨询市场带去任何新的文献资料。相反，骗子经济的结构将因此昭示天下，读者的自我防卫能力将得以提高。由于作为秩序权力象征的国家已经不再值得人们为之投去信任的目光，本书适用于使每一个公民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以便在失去控制的经济体制中为生存而参加战斗。只有那些了解了骗子“活动家”的伎俩和惯用方法的人，才能有机会去躲避他们。

人类所固有的道德禀性，以深邃的目光否定了这一残酷的、专门针对心理弱势进行欺诈和利用的商业世界的现实，并坚持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了阻止道德和价值观的沦丧，人类的道德禀性也许会倾向于以乌尔里西·维克（《诚实者就是傻子》的作者）或者耶稣教士和经理人培训师鲁培特·雷的方式来呼吁人类的良知。疯狂的资本家毫无节制地对良知或理智进行了说教，人们对付此举的希望可能会像下列的尝试一样落空，即尝试在“泰坦尼克号”轮船底部的漏洞处贴上一贴膏药。

竞争被中止

就像一个破漏的油箱中的汽油一样，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新经济的底部渗漏出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燃料——诚信。为了

使步入 21 世纪的这个世界，与以往任何的时代相比显得美丽一些、舒适一些以及更合理一些，我们已经拥有了丰厚的资本、充足的劳动力，而且知识也是现存的。然而，如果没有了诚信的底线，所有其他的资源将一无是处。如果投资者不再相信生产商，投资者将不再给予任何的投资，如果生产商不再相信经销商，生产商将不再生产任何东西，如果经销商不再相信客户，经销商将不再订购任何货物，如果客户不再相信经销商，客户将不再购买任何东西，那么，这一体系可能会完全崩溃。

幸好，还没有到这一地步。对大多数的生意人来说，渴望赢利远远超过了对损失的担忧。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在超级垄断的生活中想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牺牲品的那一种。从合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人都将成为牺牲品——雇员或消费者都是如此——而且不会有任何机会，以实践者的身份参与赢利的活动之中。感谢信息技术的高超地位，今天的牺牲者毕竟拥有了在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机会，以决定在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参与游戏。

例如，美国的网络预言家尼古拉斯·耐格罗庞特断言：“客户是赢家。”大多数的个体经营者都认为，信息的加速供应和多样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现在的客户可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到几乎每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最优惠价，并针对不同的提供商展示自己的优势。在劳工市场中，那些具备了所需知识和技能的人应当成为赢家，这是因为他们不再依赖于雇主，而是有能力为自己寻找到最合适的岗位。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信息本身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足以获取优势，人们必须有能力利用好信息。

因而，商业社会早就对自身的影响因为因特网和全球化的威胁而遭受的损失做出了反应。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以减税倾销和补贴的方式来抗拒竞争，所以这些国家也会受到跨国公司几乎是随意性的压榨。与此不同的是，许多全球玩家都在尝试着如何在自己出现的地方去中止竞争。就像著名的“七姐妹公司”，数十年来一直联手欧佩克控制世界范围的矿物油价格一样，许多的汽车和计算机制造商、银行和保险公司、化学和电器集团公司、制药公司和营养品生产商，都在追求着产品的寡头买主垄断市场（他们自己也通过互联网以尽可能合理的价格采购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此，竞争就局限于广告和“形象”，而价格却像双胞胎一样彼此相同。在贸易和服务性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形：每一次的廉价追逐都以海怪式的大型公司如麦德龙、TUI 或汉莎航空公司的介入而宣告终止。

☐ 每个行骗者都在尽其所能

此外，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已经领悟到，针对客户信息的最佳武器就是非信息化。有谁曾经尝试将不同保险公司的险种进行相互比较，那么他或她就有发言权。金融市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银行和金融服务提供商通过以信息垃圾来填塞投资者的办法，以达到阻止被人识破诡计的目的。例如，时至今日，投资基金的提供商一直都在有意隐瞒各种费用和成本的真实数额，直到客户购买了他们的证券为止。上市企业的季度报告和临时通知、资产负债表和经营报告是否物有所值，其实已经有所预示。因